

典籍英译研究·《淮南子》翻译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丁立福教授

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淮南子》作为传统道家思想集大成者素有“绝代奇书”之美誉,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员,无疑有助于中国向世界展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融百家之长编撰而成,但成书不久就遇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建议,可以说《淮南子》未及流传开来就身陷独尊儒术的尴尬处境,这使得《淮南子》传承与译介都相对滞后,直到2010年才有了英语全译本,即中国学者翟江月 and 牟爱鹏合译的 *Huai Nan Zi* 和美国学者马绛领衔合译的 *The Huainanzi*。《淮南子》翻译及对外传播研究在当下尤显迫切和重要,因而本期专栏重点推出三篇论文:丁立福的论文追踪翟江月和牟爱鹏合译 *Huai Nan Zi* 所依之底本,意在探明中国典籍翻译的底本问题。程跃的论文跟踪英语世界译介《淮南子》主流形式即选译,意在论述《淮南子》选译的历史脉络和重大意义。梁倩对《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进行多层次描述和多视角分析,发现《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及研究仍然任重道远。这三篇论文关乎翻译《淮南子》所涉底本问题、选译活动和接受实情,分别对应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整体上较能说明问题。

主持人简介:丁立福,淮南师范学院教授,舜耕学者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领军人才),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安徽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安徽省教学名师,《淮南子》译介研究的开拓者,曾主持“《淮南子》对外传播暨翻译研究”“《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等10余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专著1部及译著2部、主编省级一流专业规划教材1部,曾在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含《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外国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CSSCI来源期刊论文14篇,入选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领军人才、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安徽省教学名师等;现主持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淮南子》翻译问题研究”、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英语”建设点。

责任编辑:吴林娟

论“大中华文库”之《淮南子》翟译文底本问题

丁立福^{1,2}

1. 淮南师范学院翻译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232038;
2.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232001)

摘要:传承至今的典籍,往往因年代久远、书写语言演变以及历史社会生活变迁等诸多原因而出现数个版本,且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并有优劣之别,因此校释或翻译典籍时慎重地选择一个较为优质的版本作为底本尤显重要。对“大中华文库”之《淮南子(汉英对照版)》所依底本深入探讨发现,翻译典籍前要充分重视选择底本,依照优中选优的原则在较有影响力的多个版本中选出最佳底本,并在致谢或序跋中交代相关底本信息,以便预期读者阅读乃至研究,也可在某种意义上为其翻译提供说服力。

关键词:典籍翻译;底本;《淮南子》

中图分类号:H315.9

收稿日期:2022-12-19;修回日期:2023-0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淮南子》翻译问题研究”(22YJA740007);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科研活动经费择优资助项目“《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2021H269);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The University Synergy Innovation Program of Anhui Province)“《淮南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GXXT—2022—097)

作者简介:丁立福,博士,教授,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领军人才,研究方向为典籍译介、《淮南子》翻译。

E-mail: dinglif@163.com

引文格式:丁立福.论“大中华文库”之《淮南子》翟译文底本问题[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1):14-19.

“大中华文库”在2010年出版了翟江月主译的《淮南子(汉英对照版)》(下文简称“翟译本”),其中今译文由翟江月提供,英译文由翟江月和牟爱鹏共同提供。全书右侧页印有英译文,左侧页印有汉文,其中左侧页上部是《淮南子》原文,下部提供对应的今译白话文。这样的排版可谓精心设计,既便于了解《淮南子》原貌,又便于通过白话译文理解原作,还便于只懂得英文的人士阅读,当然最后还便于跨语言文化的相关研究。翟译本扉页配有杨牧之先生为“大中华文库”所撰汉文“总序”及其英译文,随后便有翟江月女士为《淮南子(汉英对照版)》专门撰写的“前言”并译成了英文。其“前言”的绝大部分都在论述道家思想是贯穿《淮南子》全书的轴心,只在文字简短的最后一自然段提及翻译的事情,主要就是向分别审读今译及英译稿的沈锡麟先生、温晋根先生及杨牧之先生表示谢忱,尤其是审读其初稿的奥籍学者 Adrian Parsons 先生。让人深感不解的是翟女士没有提供相关底本的任何信息——这也反映出翻译典籍时相关底本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译者、赞助人乃至出版社等相关各方都没有足够地重视底本。

一、翟译本 *Huai Nan Zi* 底本追踪

因年代久远、书写语言演变以及历史社会生活变迁等诸多原因,传承至今的典籍一般都有好几个版本,甚至这些版本之间存有巨大差异。校释、翻译典籍时选择一个相对完善的底本当是重中之重,而且需要在致谢或序跋中交代相关底本的详细信息,以便于预期读者的阅读乃至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其校释或翻译提供说服力。在西方,汉学家翻译出版典籍时几乎都要在正文前明示其所依据有底本及相关信息,如美国汉学家 John Major 领衔翻译的 *The Huainanzi* 也即国外首部《淮南子》英语全译本,其前言部分就清楚地告之所选底本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之《淮南子逐字索引》——当然,刘殿爵校订出版《淮南子逐字索引》也在其凡例中交待“本《逐字索引》所附正文据艺文印书馆影刘泖生影钞宋本”^[1],此是后话。更难能可贵的是,John Major 领衔的译者团队都由知名汉学家组成,在理解及翻译《淮南子》时难免会坚持己见,其做法是“接收刘氏校订时不作任何评论,不接收时会在注释中说明缘由”^[2]³⁷。要而言之,John Major 等译者不仅详细地交代翻译《淮南子》时所依据的底本,而且明确地告之自己与底本理解不一的具体做法,便于预期读者的对比阅读乃至进一步研究。

为达到上述目的,非常有必要小心求证出“大

中华文库”之《淮南子(汉英对照版)》的底本。先来看翟译本所据汉文第一卷“原道训”首句: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悞冥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滂,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3]²。

据张双棣^①校,庄本、集解本“源”作“原”,“汨汨”作“滑滑”,其余版本同藏本,也即用“源”和“汨汨”;藏本“凤以之”作“凤之以”,景(影)宋本、王溥本、王荃本、朱本、茅本、叶本等均作“凤以之”^[4]⁴。由此基本可以断定翟译所依版本当是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或庄逵吉校本之间。

事实上,《淮南鸿烈集解》是以庄逵吉校本为底本校勘而成,两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持相同观点,这就为辨别乃至确定翟译所依版本带来了不少困难。再来细观翟译本所据第九卷“主术训”文:

孔子之通智,过于苾弘,勇服于孟贲,足蹶致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3]⁵⁹⁴⁻⁵⁹⁶。

据张双棣校,王荃本、汪本、张本、黄本、庄本及集解本“孝”作“教”,其余版本同藏本,即作“孝”;另,茅本、汪本、张本、吴本、黄本和庄本中“其所守者约”在藏中则为“其所守者有约”^[4]¹⁰⁴⁷⁻¹⁰⁴⁸。据此,大体可以断定翟译所依版本应该是庄逵吉校本。

当然,仅凭以上两例就推断翟译文底本是庄逵吉校本,显得较为草率。下文再举两例,一是第二十卷“泰族训”文: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涔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虻虱,虻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内也^[3]¹⁴⁶²。

据张双棣校,藏本“滢”作“滢”,景宋本、茅本、吴本、集解本作“滢”,今据改,王溥本、叶本作“滢”,王荃本、朱本、汪本、张本、黄本、庄本作“滢”;另有笺释王念孙语“滢水,小水也”和《说文》

语“榮,絕小水也”^{[4]2086}。繁体字“榮”简化后为“荣”,“榮”简化后为“荣”,现综合张氏校释和相关笺释,基本可以推断:(一)藏本“榮”作“榮”,和王溥本、叶本作“荣”一样均为讹误,实为“榮”,如景宋本和集解本“榮”; (二)作“涔”的版本众多,如王荃本、朱本、汪本、张本、黄本和庄逵吉本,能否视为另一种版本呢。不过,张氏在笺释中对此做还进一步考证:道藏本和刘本都作“榮”,《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二卷鳞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榮”为“涔”,实是朱本不知榮为小水,而误以为禹贡“滎波既豬”之“滎”,故妄改之;后庄本从之,斯为谬矣。若此,《淮南子》的原貌就应是“荣水”而非“涔水”,庄本亦以讹传讹——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从上述校释和推理来观察该翟译本所依据原文,便可清楚地看出翟译所依版本应该是庄逵吉校本而非集解本。

二是第二十一卷“要略”文: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窅窅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扁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堕结细,说择搏困而以明事埒者也^{[3]1576-1578}。

据张双棣校,第一段文“此所以言兵也”同藏本及其余各版本,唯有集解本“兵”下有“者”^{[3]2188}。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排除了集解本是翟译所依之底本。第二段文“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堕结细,说择搏困而以明事埒者也”,其中“解”在张本、黄本、庄本、集解本中用字相同,但在藏本及其余版本中则用“懈”;“搏”在王溥本、王荃本、朱本、茅本、叶本、汪本、张本、吴本、黄本、集解本中用字相同,但“餘本同藏本”都使用了“搏”。结合该翟译所依据原文稍加排除,就可发现张氏所说“餘本”只可能是藏本、景宋本和庄本。反观前述第一个例证可排除藏本和景宋本属于翟译所依底本的可能,于是导向了同一个结论:翟译所依底本当是庄本,即清乾隆五十三年武进庄逵吉校刊本。

于是,笔者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年出版的庄本与翟译所依据的原文进行比对,发现果然基本一致,仍以前文例二所涉一段原文深入探讨之。翟译所依原文见图1^{[3]594-596},庄本所依相应原文见图2^{[5]99-100}。

经周详比对,翟译所依原文与庄本相应原文在句读方面存有两处细微差异,即“孔子之通智过于莠弘”文内停顿不同和“据义行理而志不慑”有无停顿不同,再就是排版上简体横排与繁体竖排的形式差异。除此之外,两者用字完全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再次证明翟译所依底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出版的《淮南子》极有可能同出一源。进而言之,翟译所依底本当是庄本。

式差异。除此之外,两者用字完全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再次证明翟译所依底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出版的《淮南子》极有可能同出一源。进而言之,翟译所依底本当是庄本。

孔子之通智,过于莠弘,勇服于孟贲,足履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技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丑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困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

图1 翟译所依原文示例

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莠弘,勇服于孟贲,足履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技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丑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困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

图2 庄本所依原文示例

二、庄逵吉校本《淮南子》

庄逵吉校本《淮南子》自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由庄氏咸宁官舍刊印后广泛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其流传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径直以原始版本为底本进行翻刻和翻印所形成的“再刻印”庄本,二是以庄氏所校为底本进行批校和笺释所形成的“再加工”庄本。据王军统计,庄本自面世至今的200余年间,“再刻印”庄本多达21种,包括姑苏聚文堂刊《十子全书》本(1804),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台湾,1965)和东京报告堂排印本(日本,1885)等^{[6]3-5}。以庄氏所校为底本进行批校和笺释所形成的“再加工”庄本,涵盖《淮南子》全书的计有19种本,较有影响的有清代顾广圻《淮南子》校本、清代卢文弨《淮南子》校本、清代孙志祖《淮南子》校本、清代陶方琦《淮南子》校本、民国学者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今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何宁《淮南子集释》和日本楠山春树《淮南子》校本(1971)等;此外,还有基于庄氏所校撰写的一些节本

和和札记,其中陶鸿庆所撰《淮南子札记》和吴承仕《淮南子校理》等有一定影响。限于精力和篇幅,笔者就不去一一搜集和对比了。

笔者手头的这本《淮南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诸子百家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共出版了包括《老子》(魏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庄子》(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管子》(唐房玄龄注、明刘绩增注)、《列子》(晋张湛注、唐殷敬顺释文)、《墨子》(清毕沅校)、《荀子》(唐杨琼、清卢文弨、谢墉校)、《尸子》(清汪继培辑)、《孙子十家注》(宋吉天保集十家注、清孙星衍、吴人骥校)、《孔子集语》(清孙星衍纂辑)、《晏子春秋》(清孙星衍校并撰音义、清黄以周撰校勘记)、《吕氏春秋》(汉高诱、清毕沅校)、《贾谊新书》(汉贾谊撰、清卢文弨校)、《商君书》(清严万里校)、《韩非子》(清顾广圻识误、宋阙名注)、《淮南子》(汉刘安撰、汉高诱、清庄逵吉校)、《文中子中说》(隋王通撰、宋阮逸注)、《山海经》(晋郭璞传、清毕沅校)、《春秋繁露》(汉董仲舒撰、清卢文弨校、赵曦明等重校)、《扬子法言》(汉杨雄撰、晋李轨注、宋阙名撰音义)和《文子缢义》(元杜道坚缢义)等20种。据其扉页的“出版说明”交代,先秦两汉魏晋朝代的“诸子百家”是中华传统思想和学术的源头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不少作品被公认为是上佳的散文精品,为后人传颂不绝。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特选20部出版,均以浙江书局精美完善的校刻本为底本,正文加上断句后分册影印出版。追根溯源起来,这20部诸子著作的底本正是光绪元年至三年(1875—1877)期间由浙江书局刻印的《二十二子》本中的20部,所落下的2部分别是宋林亿等奉敕校正《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和清徐文靖所撰《竹书纪年统笺》。历史地看,浙江书局所刻《二十二子》,选目精当、刻印精善,“外间颇称善本”^{[7][71]},由著名学者、时任浙江书局总办的俞樾^②指挥刻印:先是从藏书大家手里精选典籍底本,继而从各方网罗校勘精英,最后统一体例和版式,精雕细琢3年乃成。现观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所选校本确实基本都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大家相关校勘和研究的代表性校注精品,其中,毕沅、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等都是清代考据学兴盛时期的校勘大师,堪称诸子校本的时代盛宴,让人叹为观止。

《二十二子》之《淮南子》底本就是武进庄氏校本,在当年算是最优秀的一个校本了。庄氏即庄逵吉(1760—1813),字伯鸿,江苏武进人,故称武进庄氏,清代训诂学家、戏曲家,撰有《秣陵秋》《江上缘》《保婴备要》和《吹香阁诗草》等,独其校刊《淮南子》蜚声学界。庄氏在校刊《淮南子叙目》中曾言明校勘《淮南子》所选底本及其初衷,“岁甲辰,

逵吉读《道藏》于南山之说经台,览《淮南内篇》之注,病其为后人所删改,质之钱别驾站。别驾曰:‘道书中亦非全本,然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鋤鋹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异,正其譌舛,乐得而刻之。”^{[5][2][6][1]}简言之,庄氏是“病其为后人所删改”,并“乐得而刻之”,纯粹是为了“求真”而为之治学理念与学者精神。故而,庄氏在校勘过程中兢兢业业,凡有释义处必提供证据,凡选证据时需在元、明之前,尤其是考证《淮南子》所涉关键词、音韵及名物时更甚,较好地诠释了清朝学者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8][47]}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庄氏所校《淮南子》自乾隆戊申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问世后广受好评,其声誉远超其本人,梁启超曾语“清儒首治此书者为庄伯鸿(逵吉)……自庄书出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9][237]}。

毫无疑问,庄逵吉于南山之说经台读《道藏》、校《淮南子》时尚年轻学浅,“约在26~29岁之间”^{[10][11]},其视野及校勘方法均有限,其不足主要有三:一是以己意揣摩原作,并径直删省注文乃至删改原文,显得较为草率;二是训诂功力不足导致注音释义时有失误,显得不够完善;三是校勘所依底本不明,庄氏所选底本应是钱坫所校《道藏》本,未能进一步追溯、比校正统《道藏》本,另外校勘过程中选用对校本时也常常没有交待相关版本信息。客观而言,某些所谓不足,不独存于庄氏所校《淮南子》,因为“至迟在宋代,《鸿烈》许、高二注已难见完帙且彼此相溷。加之传写翻刻,为后人所删改,为庸夫所散乱,《鸿烈》渐致不能卒读”^{[11][457]},后经元、明两朝至清初“传说”中的《淮南子》大多真伪难辩,庄逵吉埋头训诂学追根溯源以期尽可能地大致恢复《淮南子》原貌,实是筚路蓝缕、所得已殫,开后世勘校《淮南子》之时尚。

即便乾嘉年代考据学兴盛,庄氏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顾炎武、孙诒让、钱晓徵、王念孙、王引之、俞樾、曾国藩、孙冯翼、陶方琦等方家先后对《淮南子》或审辩、或校订、或注疏、或辑佚,最大限度地探寻《淮南子》真面貌。可是,综观诸位考据学大师的相关勘订文字,要么散落于杂记中,要么将注疏内容勒成一编——在这样的著作中也仅仅是标出句读、考证诠释罢了,对于普通阅读仍是困难重重。清代相关《淮南子》考据成果可谓庞杂,时代发展至民国,亟须对《淮南子》校勘工作来一次汇总和升华——这一时代命题是由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文典先生完成。

三、后起之秀《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怀宁人,现

代著名学者,擅长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尤其是庄子研究,著有《庄子补正》《三余札记》《说苑斟补》和《淮南鸿烈集解》等。刘氏在《淮南鸿烈集解》刊发时自序:“《淮南王书》博极古今……惟西汉迄今,历二千年祀,钞刊屡改,流失遂多。许、高以之溷溷,句读由其相乱,后之览者,每用病诸。虽清代诸师如卢文弨、洪颐煊、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之伦各有记述,咸多匡正,而书传繁博,条流踏散,卷分袤异,检核难周,用使修学之士回遑歧途,沿波讨原,未知攸适。”^{[12]自序1}简言之,后世勘本多混乱繁博,难以正本清源地畅通阅览是刘氏着手校勘《淮南子》的动因。

刘文典校勘《淮南子》的系统性工作主要包括:(1)广泛搜集、梳理旧本旧注,甚至包括《白帖》《意林》《初学记》《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唐宋书籍;(2)全面考证、注疏各家之说,涉及王念孙、孙诒让、卢文弨、俞樾、洪颐煊、陶方琦、王引之、钱大昕、桂馥、顾炎武、刘绩、胡鸣玉、孙志祖、梁履绳、郝懿行等20多家之说,以期辨出正文真伪,析出许慎、高诱之注,或留存质疑。其校勘工作之庞杂、琐碎和艰巨可见一斑,刘氏书信于胡适感叹:“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13]795}这种逐字斟酌、亲力亲为的点校态度和方法充分体现了刘氏“一字之微,征及万卷”的治学精神。故而,《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胡适破例用长篇文言为其作序,述其友“上下二千年,颠倒数万卷,辩各家之同异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华,于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若商家之岁终结账然,综观往岁之盈折,正所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12]自序1[13]795},叹其友“治此书,最精严有法”,故美其名曰“总账式之国故整理”^{[13]2},并预言“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13]6}。更难能可贵的是,刘氏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1923)之后,还持续关注、补校《淮南子》:1928年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2卷合本《三余札记》,其中第一卷所含《淮南子校补》涵盖《淮南子》全书21篇,计有校补169条,约占90%的篇幅;第二卷所含《淮南子逸文》,遍引《北帖》《论衡》《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古籍,辑佚相关《淮南子》逸文29条,亦占15%强的篇幅。1938年先生继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3~4卷合本《三余札记》,其中第三卷专辑《读文选杂记》,计有38篇;第四卷专辑《淮南子校录拾遗》,涵盖《淮南子》原书中的“原道”“俶真”“天文”“地形”“精神”“主术”

“繆称”“齐俗”“道应”“说山”“人间”“泰族”12篇。又隔10年,刘氏于1948年“又以朱笔对全书点读一通,写下批语20多条,颇有价值”^{[13]459}。刘氏人生最后10年依然雄心万丈,决心完成《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和《群书校补》等;1958年7月15日先生因病逝世,在其尚未完成的《群书校补》中仍不忘录有《淮南鸿烈集解补遗》两则。这种“十年一校”的做法历史上鲜有人为之,足见刘氏之执着与严谨。

刘氏《淮南鸿烈集解》所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总账式整理,集清代以来《淮南子》校勘成果之大成;(2)普及式传承,使《淮南子》尽可能简约、流畅地展现在普通读者面前;(3)承前启后,开民国《淮南子》研究之风气,其后的吴承壮、杨树达、于省吾、于大成(台湾)及刘殿爵等众多学者都继承了刘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的研究精神,由此启迪《淮南子》研究由传统考据向现代义理的过渡和转变,也迎来了一个《淮南子》研究的兴盛时代。近人沈雁冰《淮南子选注》、于省吾《淮南子新证》、胡怀深《淮南子集解补正》和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等校勘都不约而同地挑选《淮南鸿烈集解》为底本。

刚进北京大学工作6年(1917—1923)刘文典因之而声名鹊起,但集清代校勘《淮南子》成果之大成这项工程确实太庞大、太艰巨了,而且刘氏也只耗时5载,因此《淮南鸿烈集解》也会存有一些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频繁取证于隋、唐、宋诸类书,有轻信类书之嫌疑,容易以讹传讹;二是底本舍《道藏》本而用稍逊一筹的庄逵吉校本,有底本抉择之诟病,不易超越底本固有缺陷。客观而言,“庄本、刘本对《淮南子》的流传和研究,曾起到重要的作用。”^{[10]12}

四、结语:典籍翻译底本当慎重地优中选优

客观而言,刘文典著《淮南鸿烈集解》确实存有一些不足,但是相较于庄逵吉本来说,已有相当改观,并供有极为详细的考证和注疏;另,刘氏《集解》是以庄逵吉本(1788)为底本校勘而成,其非凡成就使得《集解》成为名副其实的后起之秀。故此,翟译本选用底本时舍《集解》本、景宋北和道藏本而独取庄本,就有些失当了,抑或翟译本选用底本时并没有经过这么慎重的考量。这也反映出翻译典籍时相关底本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没有做到优中选优。作为以促进传统典籍文化走出去为己任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在选用翻译所依底本时尤要慎重,要把那些广获好评、质量有保障的版本选出来,力争优中选优。

另需指出,翟译本《淮南子(汉英对照版)》在纳入“大中华文库”出版的同年,美国汉学家约翰·

马绛(John S. Major)负责的翻译团队也合作翻译出版了国外第一部《淮南子》英语全译本 *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淮南子〉: 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相较而言,马译本获得了西方汉学家较多的赞扬,如美国关岛大学东亚研究院前任院长就称“该译本是40年来汉学研究发展的明证,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权威译本”^{[14]267}。就目前来看,一方面,“马译本在海外的发行、读者接受及影响方面均要强于翟译本”^{[15]5},其原因主要是马绛的译文相对准可信,“保留了原著中骈文、韵文等修辞特色,再现了原著的写作架构”^{[16]68},而且配备了种类丰富、内容翔实的副文本,尤其是其注释“既能提供读者所需扼要信息,又能对其来龙去脉做充分说明”^{[17]152};另一方面,马译本相对优秀与其底本选择亦存在一定关联,因此进一步追踪马译本的底本选择、集中对比研究马译本和翟译本等都是极富学术价值的课题,暂涉而不论,留待将来另行撰文深入探讨。

注释:

- ①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第2版)以明正统十年刊影印“道藏”本为底本,校之以刘泚生影写北宋小字本、明弘治辛酉王溥校刊本、明嘉靖庚寅闻中王鏊等刻本、明万历己卯临川朱东光辑订中都四子本、明万历庚辰西吴温博茅一桂刊本、明万历辛巳叶近山刊本、明万历十八年新安汪一鸾刊本、明新安吴勉学校刻本、明张斌如刻本、明宜黄黄锡禧刊本、清乾隆五十三年武进庄逵吉校刊本、民国十二年合肥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本等12种代表性版本。合计13种版本,分别简称为藏本、景宋本、王溥本、王鏊本、朱本、茅本、叶本、汪本、吴本、张本、黄本、庄本、集解本,相关版本信息详见《淮南子校释》(下)第2210-2214页“附录一”。为简便、统一起见,本文所涉相关版本亦采此法;其中,藏本间或又称道藏本;景宋本,有些引文中亦作“影宋本”,所指

指分别是同一版本。另,张双棣《淮南子校释》所涉版本基本是前述13种版本,所言“其余版本”当在此13种版本内所指。

- ② 俞樾(1821—1907),清朝末年著名学者,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史学、诸子学、训诂学,乃至诗词、戏曲、小说、书法等,亦善于读书、著书和藏书,其主事浙江书局期间刻印的《二十二子》和《二十四史》最为耀眼,对晚清的刻书事业甚至现今的编纂出版都是榜样。

参考文献:

- [1] 刘殿爵.《淮南子》逐字索引[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
- [2] Major J S, Sarah A Q, Andrew S. *The Huainanzi*[M]. Meyer & Harold D. Roth (trans. &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淮南子(汉英对照)[M]. 翟江月,牟爱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 [4]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5] 刘安等.淮南子[M].庄逵吉,校,高诱,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6] 王军.《淮南子》庄逵吉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3.
- [7] 朱炜.俞樾与浙江书局[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5(1): 70-71.
-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0] 陈广忠.《淮南子》研究书目[M].合肥:黄山书社,2011.
- [11] 彭君华.略谈刘文典对《淮南鸿烈》的贡献[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456-459.
- [12] 刘文典.淮南子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3] 刘文典.刘文典全集(卷四)[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 [14] Sellmann J D. Review of the *Huainanzi*[J]. DAO, 2013(12): 267-270.
- [15] 丁立福.论中国典籍译介之“门槛”——以《淮南子》英译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19(6): 4-14.
- [16] 孟庆波,高旭.西方汉学中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基于英文书籍的文献史考察[J].国际汉学,2018(3): 58-71+205.
- [17] 丁立福.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

On the Source Text of Zhai's *Huai Nan Zi* from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DING Li-fu^{1, 2}

(1. Cent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 hug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due to many reasons such as past ages,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hanges of historical social live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hoose a high-quality source text among different versions before interpreting or translating them. With an exampl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ource text of *Huai Nan Zi*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by Zhai Jiangyue & Mou Aipeng, it is intended to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source texts, the choice of the best one among different versions with much more influenc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its relevant details in the preface or postscript, in order to offer convenience for readers' reading & research and enhance persuasion of the translation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Classics' translation; Source text; *Huai Nan Zi*